

王忆：文学创作让我能够独立自由地“奔跑”

■ 口述：王忆 青年作家 ■ 记录：富东燕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我热爱写作。从19岁到现在的14年时间里，我坐在轮椅上，用并不灵活的一根手指，努力敲击着键盘。先后出版了散文集《轮椅上的青春》《在轮椅上奔跑》、诗集《在静寂里逆生长》《拥抱月亮入睡》、长篇小说《冬日焰火》、短篇小说集《不虚此行来看你》等多部作品，总出版发行字数超200万字。我也因此被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称赞为“不倒的生命之树”。

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在北京举办，举世瞩目，我有幸参与其中：我为冬残奥会歌曲《残健共融 拥抱未来》创作了歌词；同时，我的诗集《拥抱月亮入睡》由中国残联宣文部转赠给了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我希望所有的残疾人朋友都能够励志奋发、勇敢追梦，平等参与社会生活，一起向未来。

命运多舛

我出生于1989年的冬天，老家是江苏盐城。大概8个月的时候，医生诊断我为“小脑偏瘫”，甚至预言“活不过十岁”。但我的爸爸妈妈没有放弃我，为了给我看病，他们卖了家中值钱的东西，又向亲戚借了钱，带着我到北京、上海等各大医院，遍访名医。

最终，我在北京做了一次大手术，在腰椎上留下了30多厘米长的伤疤，换来的是我可以像其他孩子那样坐着。第二年，我的双腿又做了一次大手术，只为解决上厕所浑身颤抖的问题。之后，我又做了双侧颈动脉鞘交感神经网剥脱术。在我身上，每跨出一小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三次大手术后，虽然我的身体功能在一点点恢复，但不能改变我作为重度脑瘫患者的事实，双手变形，不能正常流畅与人沟通交流，无法行走，只能坐在轮椅上。

吃饭、穿衣、说话、行动……无论干什么，对于我来说都是困难重重，但我的头脑是清醒的，我是有思想和梦想的。小时候，看到窗外的小朋友背着书包去上学，我羡慕极了，我也想要上学。

1998年，也就是我9岁的时候，为了让我接受教育，我们全家搬到了南京。爸爸坚持要让我到普通学校学习，在走访了多所学校后，终于有一所学校答应让我去试读。爸爸妈妈为此还写下承诺书，保证我不会影响到其他孩子。

在父母的坚持和呵护下，我上完了初

► 王忆荣获北京冬残奥会残健融合原创主题歌曲优胜奖。左边是她的父亲。



► 王忆在自家书房。目前，她已出版多部作品，总发行字数超200万字。

中。之后，又为我请高校研究生做家教，完成了高中和大学的部分课程，这期间，我也自学了大量的文学知识。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让我获得了重生。

邂逅文学

人们常说，当上帝关了这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这句话，在我身上得到了应验。我是幸运的。

上学后的我，渐渐喜欢上了文字。记得10岁那年的圣诞节，参加完学校组织的篝火晚会后，我用一篇小短文写下了当时的感受，那算是我“写”下的第一篇文章。因为不能像常人一样握笔，我写下每一个字，都得用尽全身的力气，写得很费劲，但却被文字的魅力深深吸引。从那时开始，我坚持每天写作。

我越写越有感觉，并因此受到了极大的

鼓励。二年级时，我的作文被老师贴在教室后的黑板上；四年级时，在作文比赛中获得一等奖；初中时，作品在南京市作文比赛中摘得优胜奖项……14岁时，我在日记本里写下了未来的梦想：当一名作家。

网络的出现，让我和这个世界、和我的梦想越走越近。虽然我只能用一根手指敲击键盘，但对我而言，已经感觉很幸福。很多人都会觉得，我用一根手指打字写作，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而事实是，只有在投入写作的时候，我才能从意象到具象，变成一个完整美好的自己。

最初，我是在一个文学贴吧里写小说，写了一段时间后，一位杂志社的编辑留言说要帮我出本书，我本以为是个骗子，结果一个月后，对方就把那本样书《心中的青岛》快递到了我家。

创作时那种自由和幸福的感觉让我沉醉

其中，文学创作为我单调的生活打开了全新的模式。26岁那年，我将自己从19岁开始写的随笔整理成书，我的随笔集《轮椅上的青春》随即出版。而在那之前，我从未想过自己能够在二十多岁时活出一个真正的自己。

再之后，我参加了省作协的读书班和写作培训班学习，同时也加快了写作的步伐。2016年，出版诗集《爱，不能等》；2017年，出版诗集《等待春天》；2018年，出版诗集《爱，无止境》；之后，又完成了长篇小说《冬日焰火》、短篇小说集《不虚此行来看你》、散文集《在轮椅上奔跑》等多部作品……

我也因此获得了一些荣誉。比如第三届中国青年诗人奖，第十届全国文学奖，第八届上海“好童书”奖，第三十三届华东六省优秀少儿读物图书类一等奖，中国出版协会儿童阅读好书榜“生命教育”出版图书奖等。

我要感谢很多作家前辈和老师给予我的

鼓励和认可，是他们的引领和鼓舞让我越活越精彩。尽管我的身体被禁锢在那一小方空间内，但文学创作让我能独立自由地“奔跑”，让我与命运碰撞出最美的火花，“一株无人问津的小草，在抖落风雪过后，终于扬起明媚的微笑”。

传递大爱

我曾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字，多写一行；梦，就更进一步。

在我最初确立要成为作家这个梦想的时候，周围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一个无法独立的残障人就应该待在自己的世界里，把简单平凡的日子过好就是对他人最大的安慰和帮助。但是我的心灵和思想不允许我只是一个活着的人，我要去创造比现实生活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

这个事情是什么？是通过我的文字诠释爱、传递爱，并给人以前行的力量。

“爱”是我作品中永恒的主题，囊括亲情、爱情与友情。“爱”，是爱自己、爱身边的人、爱我热爱的文学、爱我所爱的一切。这是小爱。我还想传递给广大读者的爱是我们互相的爱，以及与城市和世界的大爱。也许我们彼此素不相识，但当通过文字面对面时，我们之间产生的共鸣也是一种必然存在的爱。我是如此认为，也是这么做的。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在我的作品分享会上说，“王忆写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内容里充满了生活应有的温度”。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说，“王忆内心明媚的阳光透过纸张，光芒万丈地四射开来，带给我们每一个人力量与希望”。著名作家范小青表示，“王忆的整个作品情感真挚感人，能够打动人”。诗人刘立云认为，“从诗歌写作角度来讲，善的、美的、阳光的东西，在王忆的诗歌里面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记得在创作《残健共融 拥抱未来》歌词的时候，我以一个感同身受的残障者角度出发，写下了这首开头的第一句：“没有谁能阻碍，万里之光照耀世界。”因为我觉得，作为许多身患残障的不屈之人，曾经我们渴望走出困境是多么艰难，然而只有自强不息，冲出疾病与困难的重围，任何艰难都将不足以阻碍我们与这个光耀世界交汇。

张海迪主席说：文学是心灵的篝火，即使严寒也会让人感到温暖。对我而言，文学是我身体和生命的延伸，我热爱文学，是文学帮我敲开人生的大门。我希望，通过文学让自己绽放出更美好、更绚烂的生命。我更希望，天下所有残疾人的生活都不设限，都能够向着明亮阳光的明天勇敢迈进。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

——百岁抗战女兵李莉深情缅怀抗日英雄郭秀祯



建国后的郭秀祯

作为一名百岁抗战老兵，每当清明时节，我的心情总是许久无法平静。在缅怀我们牺牲和逝去战友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不断闪现出冀中抗日战场上那位为革命出生入死、铮铮铁骨的抗日英雄郭秀祯同志的光辉形象。

郭秀祯，1911年出生于河北蠡县刘村一户农民家庭，兄妹七人中排行最小，全家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因家境贫寒，从小就养成了坚毅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1928年，18岁的郭秀祯嫁与梁斌结为夫妻，梁斌是以《红旗谱》等长篇巨著而闻名中外的小说家，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冀中新世纪剧社社长。

抗日战争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

要唤醒广大民众，打败日本侵略者，需要革命的武装队伍，也需要革命的文化队伍。冀中新世纪剧社是冀中抗日武装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演出队、宣传队，以文艺为武器，宣传群众，打击敌人，瓦解敌人；同时，也是一支深入配合党联系群众、密切军民鱼水关系的工作队。

梁斌社长信仰坚定，才华横溢，带领我们全身心投入到文艺创作和演出的工作，把新世纪剧社打造成了一支善于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抗战工作队”，为宣传抗日做出了积极贡献。他根据自己亲身革命经历创作的文学巨著《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在新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坛上树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有着一位伟大的女性。梁斌抗战时期辉煌壮丽的人生之中，他的夫人郭秀祯不仅是位默默支持和奉献的好妻子，而且是位抗战英雄！

时局动荡，志在为普天下的百姓“谋稻粱”的梁斌常年奔波在外。1936年梁家分家之后，梁斌家没有男劳力，郭秀祯只身拉扯着几个幼儿，还要照顾老人，生活十分艰难。1937年春，梁斌回到冀中，在蠡县发展组织，组建救国会。那时，斗争环境十分残酷，日本鬼子和伪军时常到冀中扫荡，实行“三光”政策，不断来村抓人。

在内外交困的危难情况下，郭秀祯以极大的热忱参加了救国会的工作，同张志英、祝凤书、赵小棉等进步女性一起，组织广大妇女做军鞋、制棉被、敛麦子、磨面、敛鸡蛋，支援抗日前线，宣传群众，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声有色地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梁斌时任冀中文建会文艺部长、冀中新世纪剧社社长，他和郭秀祯家也就成了文建会干部和新世纪剧社的同志们经常往来的住地和联络点。不论酷暑

署寒冬，还是白天黑夜，郭秀祯为同志们送信、站岗、放哨，不辞劳苦，以过人的胆识，机智巧妙地与鬼子和汉奸周旋，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大批八路军干部、战士。

1942年“五一一大扫荡”，日军在冀中战场上集中了十几万人，与吕正操、程子华将军领导的冀中部队两万多人展开决战。8月的一天，我在新世纪剧社戏剧队队长傅铎同志的兄弟、民兵队长傅铜台的护送下，穿过众多敌人的岗楼，深夜潜入梁家庄梁斌和郭秀祯的家中坚壁。

面对紧张战争形势，郭秀祯十分警觉，傅铜台几次轻声叩门，均无回应。最后暗号对上，她才开门将我迎了进去。在她家，我意外而惊喜地见到了先期来这里寻找组织的姐姐穆琴，她是我们七人小分队负责人。郭秀祯简单交代几句后，又带上门出去站岗放哨了。

我好奇地问：“大嫂怎么像个专业的地下工作者，警惕性这么高！”穆琴说：“梁社长家就像个地下收容站，几乎每天半夜三更都会有一批批的区里干部和剧社的同志们来到这里。有时鬼子汉奸也冒充八路军来叫门。大嫂不得不加倍小心，这是时刻都关系着八路军干部战士生死存亡的大事。她天天细心谨慎地把握着这个生命交通站的命脉，已经不知有多少人通过大嫂的掩护，去了路西，都没有出过半点

差错。”

“不打紧，不打紧。用俺这一命，换你们几条八路将士的性命，划算！划算！”我清楚记得有一次郭秀祯奔回家中，回身将街门关上，用木棍死死顶住。她脸色严峻，但丝毫不见慌乱，对着她年幼的儿子说：“宝昌，带着刘叔和李叔钻地洞；宝来，马上告诉王叔和邱叔架梯上房，穿过两家，到三大伯家夹壁墙里藏起来。宝璋，领着大姨、二姨去仓库。”

梁斌同志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给孩子们郑重留下遗言：“就在我们梁家庄的院中，为你们母亲立上一块碑，以为永久性的纪念，也表达我对她深深的歉意和敬意！她在抗战期间对革命工作是兢兢业业、尽心尽力的。敌人五次抓捕我，



梁斌、郭秀祯故居